

論唐高祖之才略

李樹桐

一、引言

世之論史者，常常把漢高祖明太祖並稱為平民皇帝，把漢高祖唐太宗並稱為創業的君主，而加以種種稱讚，對於唐高祖，則很少人提及，縱然提及，不說他平庸，便批評他無能，幾乎成為異口同聲的定論。作者原先亦信而不疑，但近十年來，時常閱讀新舊唐書及其他有關唐代諸史籍，當初閱到高祖本紀後面史臣曰下有「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之句，頓覺和向來的觀念有些矛盾。再看許多有關唐高祖的記載，認為唐高祖不只平庸無能，而且是十足的具有英雄氣概。但是在另一方面，表現高祖平庸無能的記載，確也數見不鮮，於是引起作者的懷疑了。唐高祖的才略究竟怎樣？這個問題常常懸於腦海而思有以解決。積數年後，漸漸形成一愚之見。爰草是文借以就正於現代的好史諸公，並希望在共同研討中，對唐高祖的才略，得到一個正確而真實的結論。

二、有關唐高祖平庸的諸記載

有關唐高祖平庸的諸記載，隨處可見，這大概是唐高祖被判為平庸無能的史料根據。茲擇其重要的數則，列舉如下：

(一) 唐高祖留守太原，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有安天下之心，陰結豪傑謀舉義而高祖不知也。劉文静坐與李密聯婚，繫太原獄中。世民就省之，與文静共商舉義大計，恐高祖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見高祖與裴寂有舊，每相宴語，劉文静欲因寂開說，引裴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世民乃以其謀告，求向高祖勸說。寂許諾，私以晉陽宮人侍高祖，乘酒酣以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相告，高祖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後高祖遣高君雅、王仁恭擊突厥，戰不利，懼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高祖，高祖大驚，欲執世民。世民曰：「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高祖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再說高祖，高祖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作者由舊唐書劉文静裴寂諸傳摘錄）

(二) 「大軍（由太原）西上賈胡堡，隋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義師。會久雨糧盡，高祖與裴寂議，且返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遇小敵即班師，將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太原一城之地

，是爲賊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納，促令引發。太宗遂號泣於外，聲聞帳中，高祖召問其故，對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必尅（克），退還則必散，衆散於先，敵乘於後，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三）「宋金剛之陷蒲州也，兵鋒甚銳，高祖以王行本尙據蒲州，呂崇茂反於夏縣，晉澮二州相繼陷沒，關中震駭，乃手勅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河東之地，僅守關西而已。』」太宗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精兵三萬必能平殄武周，克復汾晉。」高祖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之，又幸長春宮親送太宗。（武德）二年十一月，太宗率衆趣龍門關履冰而渡之，進屯柏壁，與賊將宋金剛相持。……於是劉武周奔於突厥，并汾悉復舊地。詔就軍加拜益州道行臺尙書令。」（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四）「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唐將士皆疲弊思歸，摠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上（指唐高祖）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唐紀四）

（五）「（武德七年秋七月）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甲子（疑爲甲午），車駕還京師。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諭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虛言也。」上乃止。」（通鑑卷一百九十一唐紀七）

三、唐高祖平庸說的不合理

根據以上記載的任何一二條，就可以品評唐高祖爲平庸無能了。何必五條甚至更多。無怪乎唐以後千餘年來的治史者都認定唐高祖爲平庸無能了。雖然如此，舊唐書裡史臣所作的評語，也是根據「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辭答李密之書。」等事實作根據的，並不是無憑的空論。彼此所根據的史料，就發生了相互的衝突矛盾。事實的真像，不應當互相矛盾的。在彼此相互衝突矛盾的史料中，必有真僞之分。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對於以上提出唐高祖之所以被判爲平庸無能的各條史料，實有仔細

研究的必要。茲逐條研究於下：

(一) 關於太原起義謂係太宗首謀，高祖爲被動一事，作者曾作「李唐太原起義考實」一文（載大陸雜誌第六卷第十期第十一期）結論是：「李唐太原起義，實爲高祖主動，決非太宗首謀。所謂太宗首謀之說，實爲史官偽造。」茲不贅論。

(二) 賈胡堡太宗夜哭勸阻高祖返師之事，亦有不合情理，令人不能相信之處。另據溫大雅著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記此事曰：「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指建成）二郎（指世民）等而謂之曰：『……諸公意謂何？』」議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遙，李密誣誣，奸謀難測，突厥見利則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教旨。」帝顧謂大郎二郎等曰：「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太原，寧肯近亡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既聞唐國舉兵，憂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驍將精兵，鱗次在近。今若卻還，諸將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生。營之內外，皆爲勦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競來。進闕圖南，退窮自北，還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沉，近於斯矣。且近來禾菽被野，人馬無憂。坐足有糧，行即得衆。李密戀於倉米，未遑遠略。老生輕躁，破之無疑。定業成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捐軀力戰，所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請勿他問。兩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得之耳，吾其決矣。三占從二，何籍與言，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帝既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當然是高祖已接受了大郎二郎的意見了，何至於「促令引發」？既不至「促令引發」，太宗何必再去夜裡哭勸！這種不合情理的記載，當是史臣對太宗有意的溢美之詞。

考大唐創業起居注（以下簡稱創業注）的作者溫大雅，是高祖起義時大將軍府的記室參軍，專掌文翰，常常隨從高祖。創業注三卷，係從太原起義到高祖即帝位的三百五十七天以內，溫大雅親見親聞的記錄，所記當屬可信。第二、舊唐書溫大雅傳云：「武德元年，歷遷黃門侍郎……尋轉工部，進拜陝東道大行台工部尚書。太宗以隱太子、巢刺王之故，令大雅鎮洛陽以俟變。大雅數陳密策，甚蒙嘉賞。太宗即位，累遷禮部尚書，封黎國公。」可知大雅是接近太宗，被太宗重用的。他的所記，決不至有隱太宗之功而不書的。假設真有太宗夜裡哭勸高祖之事，大雅何至於略而不書？第三、創業注成於武德年間，以溫大雅和高祖太宗的關係，太宗縱未親眼看到此書，亦必知其大概。假設太宗哭勸之事爲真，便是大雅隱了太宗的大功，太宗何不提出讓他補入或修改？如此，溫大雅所作創業注對此事的記載，必與事實符合而可信。舊唐書太宗本紀所載賈胡堡太宗夜間哭勸高祖事，與創業注被認定爲可信的史料不同，顯然不符合於事實。其爲史臣溢美太宗的痕跡，正和太宗首謀起義相同。其不可信的程度，亦和太宗首謀起義一樣。

(三) 宋金剛陷滑州，高祖令棄河東事，亦是於理不合的。因爲假設高祖真有放棄河東之意，他的心理應有兩種可能。一是視河東土地無足輕重；二是畏敵不前。舊唐書巢王元吉傳說：「（劉）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給其司馬劉德威

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携其妻妾棄軍奔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寶誕字文歡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字文歡首畫此計，我當斬之。」這可見高祖對并州的重視。并州雖是起義興運之基，但離關中稍遠。河東和關中只一水之隔，對關中的威脅更甚。高祖因并州之失要斬字文歡，足證明他不甘心放棄并州。若謂高祖肯放棄關係天下安危的河東，天下寧有是理？舊唐書卷五十五劉武周傳說：「高祖親幸蒲津關，太宗自柏壁輕騎謁高祖於行在所。」更可以證明高祖絕不是怯懦畏敵的，而且爲收復失地不惜冒險親征。怎能手勅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呢？既重視土地又非畏敵不前的高祖，怎能肯命令放棄河東？

舊唐書劉武周傳：「武周授（宋）金剛西南道大行台令率兵二萬人侵并州，軍黃虵鎮，又引突厥之衆，兵鋒甚盛，襲破榆次縣，進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衆討之。爲賊所執，一軍全沒，仲文後得逃往。復遣右僕射裴寂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逼，總管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宋）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沒於賊。進取潯州，屬縣悉下。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自號魏王以應賊。河東賊率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關中大駭。高祖令太宗益兵進討，屯於柏壁，相持久之。又命永安王孝基、陳州總管于筠、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進取夏縣。」可見高祖對討劉武周的軍事，向來是再接再厲的。前後的行動，都是積極的，一貫的，調和的。假設高祖有命令放棄河東之事，那末，這事和高祖前後一貫的積極行動，便衝突矛盾的不可解了。

舊唐書劉武周傳既說：「關中大駭，高祖命太宗益兵進討。」新唐書亦說：「關中震動，高祖詔秦王督兵進討。」舊唐書獨孤懷恩傳說：「劉武周將宋金剛寇潯州，高祖悉發關中卒以隸太宗屯於柏壁。懷恩遂與解縣令榮靜……謀引王行本兵及武周連和。」唐儉傳說：「夏縣人呂崇茂以城叛降於劉武周，高祖遣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等率兵討之。」都沒有提高祖令棄河東，更沒有太宗表諫之事，益知太宗本紀所載，與事不符。當係另有用意。

（四）關於太宗圍王世充於洛陽時高祖密敕使還師事，與其他記載處處衝突矛盾，所以疑非事實，其理由如下：

（甲）關於此事，舊唐書卷六十三封倫（字德彝）傳說：「太宗討王世充，詔倫參謀軍事，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師。太宗遣倫入朝論事勢，倫言於高祖曰：『世充得地雖多而羈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窮，破在朝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結，復必難圖，未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納之。」只言「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師，」並云提到密敕的事。而且「意欲」二字，何等抽象！顯然和通鑑所記不相符合。

（乙）舊唐書太宗本紀，不只沒有高祖密敕旋師，也沒有高祖意欲旋師，更沒有太宗遣封倫說高祖事。假如此事爲真，這是太宗轉危爲安，匡正全局的大功，太宗本紀裡何故隻字未提？

（丙）舊唐書太宗本紀說：「於是進營城（指洛陽）下，世充不敢復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太宗遣諸軍掘塹匝布

長圍以守之。」又說：「太宗曰：『世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敵。』」分明是太宗於合圍洛陽以後，採用圍困政策了。通鑑竟記：「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唐將士皆疲弊思歸……劉弘基等請班師。」明明和太宗本紀所記不相符合。

(丁)通鑑武德四年二月辛卯(三日)記曰：「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指唐高祖)謂士及曰：『歸語秦王(指秦王世民)今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可見高祖對於克城以後的事情，都已預先安排妥當了。所以十天以後「辛丑(十三日)世民移軍青城宮。」就是進圍東都行動的開始。事情的發展是一貫而可信的。封倫說高祖事，通鑑繫於二月乙卯(二十七日)，依理而論，假設有高祖密令旋師事，必定根據太宗或其他人的報告，發現對唐師不利的情形，高祖纔會改變以前計劃的，決不是「師久在外」不切實際的理由所能解釋的。考當時的局勢，四面都是有利於唐。在西面：唐已滅掉薛舉所建的秦和李軌所建的涼，完全除掉後顧之憂。在東面：據有淮河流域的杜伏威已經降唐，並且於武德四年正月，遣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已攻克梁地(今河南東部)。在南面：武德四年正月，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五州四鎮皆克之。據有今兩湖一帶的蕭銑，正自顧不暇，決沒有力量阻止唐軍的進攻王世充。在北面：武德三年五月，劉武周已為突厥所殺，現今山西一帶，已經平定，是年十月，據有漁陽(今北平東北)的高開道遣使降唐，唐封開道為北平郡王，賜姓李。武德四年「正月丁卯(初九日)竇建德行臺尚書令胡大恩以大安鎮來降。」(舊唐書高祖本紀)，辛巳(二十三日)「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通鑑卷一八八)當時的環境全是對唐有利的，照竇建德的中書舍人劉彬(斌)對竇建德所作的估計是：「唐強鄭弱，其勢必破。」(舊唐書竇建德傳)這就是唐高祖預先安排克城之事的事實根據。

自太宗移軍青城宮後，唐軍更是順利了。迫的王世充由出城與王師相抗，漸漸「不敢復出」了。王世充的大將單雄信裴孝達和唐總管王君廓在洛口相持的兵，也被戰敗遁去了。至二月乙卯(廿七日)，正是所謂封倫說高祖之日，「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通鑑)。那時竇建德來救王世充的兵，還沒有達到周橋。(二月廿日纔達到)唐高祖何所根據而密令旋師呢？據通鑑所記，圍洛陽之時，太宗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高祖根據這些消息密令還師，他是故意擾亂軍心呢？或是故意要犯太宗所定的斬罪呢？無論如何，都是講不通的。

(戊)通鑑記太宗率軍直抵洛陽城下之時為二月辛丑(十三日)，直至二月二十二日，王世充之將單雄信裴孝達仍在洛陽北面的洛口和唐軍相持。假設太宗有四面圍攻洛陽晝夜不息之事，則開始攻擊之時，很可能在二月二十二日將單雄信擊敗以後，最早不得在二月十三日之前。縱然假設在二月十三日即行開始，則「晝夜不息，旬餘不克。」的消息傳到住在距洛陽八百五十里遠的長安城的唐高祖，應當在二月二十五日以後，甚至二月底了。待高祖密令班師的密令傳到洛陽，太宗再令封倫去長安

入朝高祖，依洛陽長安的距離計算，又要五天或六天以後，無論如何，最早當在三月初旬。通鑑繫封倫說高祖事於武德四年二月乙卯（二十七日），現在從任何方面判斷，縱然假設真有其事，但是時間絕對不可能是在二月乙卯，可以斷言。

（己）再退一步假設封倫說高祖事，不發生在二月乙卯而在以後，那末，所遇到的衝突矛盾更不可解釋了。通鑑於武德四年三月壬午（二十四）記曰：「竇建德陷管州……水陸並進，（即來援王世充）……蕭瑀、屈突通、封德彝（即封倫）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指克周橋虜孟海公事）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在洛陽西北），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虎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強，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吾計決矣。』」這是封倫說太宗而未蒙採納的事實。假設封倫在三月初旬有說高祖之事，何以先前對高祖說：「世充……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力盡窮，克在朝夕……」而不久的以後反又對太宗說：「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呢？據舊唐書卷六十三封倫傳，封倫是以揣摩諂詐著稱的。假設太宗曾有：「言班師者，斬！」的話，並且封倫曾有奉太宗命說高祖的事，則封倫必定早已明瞭太宗的態度了。何至於再以不投機的話去說太宗以撞沒趣呢？後來既有說太宗的事實，則以前被派說高祖的記載，當係偽造。

（庚）舊唐書卷八十三郭孝恪傳說：「竇建德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運阻絕，此是天喪之時。請固虎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為克。』太宗然其計。」舊唐書卷七十三薛收傳說：「太宗討王世充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為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此可作封倫會說太宗的旁證）收獨建策曰：『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為我所持，求戰不可。（此可作太宗曾採摺因政策而未急攻的旁證）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鬪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既破，世充自下矣。』太宗納之。」據此可知唐軍有被王世充竇建德夾攻危險之時，郭孝恪有「請固虎牢，屯軍汜水」之計，薛收有「先據成皋」之策。「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的唐高祖，在唐軍一帆風順毫無危險之時，何至於密令班師？更何況是緊接在太宗下令曰「敢言班師者斬！」以後呢？總觀前面所引通鑑對高祖密令班師的一段記載，與其他的記載多方面的衝突矛盾而不可解釋，如除掉這段記載，另外的各種記載，彼此間都可相互符合。所以斷定這段記載必係偽造。

（五）突厥屢次入寇，高祖令遷都以避之，太宗數諫乃止事，其不能使人相信，亦如以上諸條。

考唐高祖擊突厥事，重要戰役至少有兩次，一次是隨大業十二年（西元六一六）十二月率王仁恭等擊突厥於馬邑（以下稱

馬邑之役），一次是隋義寧元年（西元六一七）五月，高祖起義時，突厥寇太原（以下稱太原之役）。馬邑之役的情形，據創業注所記是：

「既至馬邑，帝（指唐高祖）與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恒其陳，以弓矢爲瓜牙，以甲冑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羊馬爲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慙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擣粳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於是，與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聖主（指隋煬帝）在遠，孤城援絕，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言而詣理，聽帝所爲，不敢違異。乃簡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騁射獵，以曜威武。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營卒與突厥相遇，驍銳者爲別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以其所爲，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是再三，衆心乃安，咸思奮擊。帝知衆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勤（勒）所乘駿馬，斬首數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胆，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

太原之役的情形是：

「（五月）丙寅，而突厥數萬騎抄逼太原，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劉文靜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列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衆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其所部千餘人，與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設伏，誠之待突厥過盡，抄其馬群，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登城東南樓望之，且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勇於抄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厥前後夾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既無出力，並墜汾而死，惟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私有危懼，皆疑王威，（高）君雅招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懼甚于常，顧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而九，稱帝圖王，專城據郡。孤荷文皇殊寵，思報厚恩，欲與諸賢立功王室，適欲起兵，威雅沮衆，深相猜忌，密講異謀，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豈謂繫之二日，突厥果入太原，此殆天心爲孤罰罪，非天意也，何從而至？天既爲孤遣來，還應爲孤令去，彼若不去，當爲諸軍遣之，無爲慮也。』帝以見兵未多，又失康達之輩，戰則衆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援，仍誠出城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去，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輩無故遠來，他又不與我戰，開城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贖我，我以唐公爲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盡死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己亥夜，潛遁。」

隋書煬帝本紀於大業十三年（即義寧元年）五月亦載：

「甲子，唐公起義師於太原，景（丙）寅，突厥數千寇太原，唐公擊破之。」可見太原之役，唐高祖擊破突厥之事爲可信。由以上記載，可知唐高祖對突厥作戰時，是很沉着的，不畏懼的，有辦法的。在馬邑他能對王仁恭講解對突厥的戰略，並對突厥「馳騁射獵，以曜威武。」在太原時他能對突厥「示以不測」且「夜設伏兵出城據險。」何以在突厥寇并州（或原州）之時，高祖就沒有辦法了呢？馬邑太原二地距突厥的根據地較近，馬邑太原二役，高祖均親臨前線，而且兵力又少，都能「神色自若」的從容應付。長安距突厥根據地較遠，而且那時（武德七年）天下大致已定，高祖的兵力較前增強數十倍，高祖以優勢的兵力據優越的地勢，何以反倒怕寇邊的突厥呢？

考所謂「高祖令遷都」以避突厥事，通鑑繫於武德七年七月，在這一個月裡，高祖令遷都之前，突厥曾有五次入寇！（1）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2）戊寅突厥寇原州，（3）庚辰突厥寇隴州，（4）癸未突厥寇陰盤，（5）己丑突厥吐利設與宛君璋寇并州。這五個被突厥寇擾的地方，距離唐的京師長安均非甚近，而且突厥寇朔州時，由「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却之」，寇原州時，「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邀其歸路。」寇隴州時，「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以上均據通鑑）突厥都沒有得手，更沒有順利的深入內地對長安發生大的威脅。高祖於此長安不受威脅之時而主張遷都，於理極爲不合，這恐怕是史官爲太宗進諫而預先僞作的佈局吧。

據舊唐書高祖本紀載：「（武德五年八月）丙辰，突厥頡利寇雁門，己未，進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討擊，大敗之。」「（武德六年）秋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備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傳載：「（武德）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道自原州連營南下，太宗受詔北討，齊王元吉隸焉。」高祖本紀：「（武德八年六月甲子）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由以上諸條記載，可見在所謂「高祖令遷都」的以前和以後，高祖對突厥的一貫策略是討擊和防備。高祖部下的將領雖多，而最親信的莫過於他的兒子，高祖的防備突厥，常常命令太子和秦王以及齊王元吉，可見高祖對防備突厥的注意。在高祖一貫的極力注意防備政策之間，他怎能忽然改爲消極的退避——命令遷都呢？

舊唐書卷六十三封倫傳稱：「會突厥寇太原，復遣使來請和親，高祖問群臣和之與戰，策將安出，多言戰則恐深不如先和，倫曰：『突厥憑凌，有輕中國之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臣計者，莫若悉衆以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復和，恩威兼著，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臣以擊之爲便。』高祖從之。」（通鑑繫此事於武德五年八月）。這很顯明的是高祖採取了先戰後和的主張。通鑑於此事以後，緊接着記有：「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瑒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崗鎮，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壬寅，定州總管饒士洛等擊突厥於恒山之南。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

「等等，都是戰勝的成績。」

通鑑於武德六年六月記曰：「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指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歲爲寇，良以馬邑爲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蔚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收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爲勇將？』即命世讓戍蔚城。」可見高祖對於備邊的注意與積極。

舊唐書卷六十一贊靜傳謂：「轉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指武德六年十月）突厥數爲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頻上書辭甚切至，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千斛。高祖善之，令檢校并州大總管。靜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郭塞，復從之。」通鑑武德六年載：「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更可看出高祖對於防備突厥的一貫政策。

武德五年三月，通鑑稱：「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婚，頡利乃遣漢陽公瓊鄭元璠長孫順德等還。庚子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那德等還。」是年十月又稱：「上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遷高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邑……頡利自帥衆攻城……上命行軍總管劉世讓救之……會頡利遣使求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可見高祖是以通婚爲對付頡利的手段。馬邑雖然重要，當然不能和京師長安相比。高祖可以用通婚的手段要求頡利解馬邑之圍，可見高祖對突厥，是決不願意無條件讓步的。若謂突厥寇并州或原州之時，高祖將要焚長安而遷都，天下寧有是理？

以上有關高祖平庸無能的諸記載，和其他記載衝突矛盾的不可解，也不合理（理由詳後），那末，爲什麼發生這些不合理的記載呢？它的目的是什麼？大史學家司馬光的言論極有參考的價值。資治通鑑武德五年十二月「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劉）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陣），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衆遂大潰。」一段的下面，司馬光加考異曰：「……太宗實錄云：黑闥重反，高祖謂太宗曰：『前破黑闥，欲令盡殺其黨，使空山東，不信吾言，致有今日。』及隱太子征闥平之，將遣唐儉往，使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小弱及婦女，總驅入關，以實京邑。太宗諫曰：『臣聞唯德動天，唯恩容衆，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蠶綿之鄉。而天府委輸，待一成績，今一旦見其反覆，盡戮無辜，流離寡弱，恐以殺不能止亂，非行弔伐之道。』其事遂寢。……按高祖雖不仁，亦不至有欲空山東之理，史臣專欲歸美太宗，其於高祖亦太誣矣。」司馬光看破這是臣史欲歸美太宗的偽造，這實在是深識卓見。

同書，武德三年五月「秦王世民引軍自晉州還攻夏縣，壬午屠之。」之後，考異曰：「高祖實錄：帝曰：『平薛舉之初，不殺奴賊，致生叛亂，若不盡誅，必爲後患。』詔勝兵者悉斬。疑作實錄者歸太宗之過於高祖，今不取。」武德四年六月「初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請盡輸己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的後面，考異曰：「舊傳云高祖不許，按太宗得洛陽即誅雄信，何嘗稟命於高祖。蓋太宗時史臣叙高祖時事，有不厭衆心者，皆稱高祖之命，以

掩太宗之失。如屠夏縣之類皆是也。」這又是司馬光所找到的作實錄史臣歸太宗之過於高祖的證據。史臣的「專欲歸美太宗」爲目的，以「歸太宗之過於高祖」爲方法，所以有不厭衆心之事，皆稱高祖之命。史臣爲達此目的，敢誣高祖種種殘忍不仁，至於誣高祖平庸無能，懦弱，退縮等，史臣豈不更無顧忌了麼？以上所舉高祖平庸無能的幾項記載，當然屬於史臣誣高祖之一類，所以判斷爲不可信的偽造。

四、唐高祖才略的真像

關於高祖的記載，現在所能看到的，很多是經許敬宗竄改或偽造，但是許敬宗想用一枝筆盡遮蔽住天下後世人的眼睛是很難的。他能改正面，不能改側面，能改顯明處，不能改隱暗處，所以唐高祖才略的真像，仍然可以從未被竄改的史料裡搜尋出來。茲分述於下：

（一）唐高祖的性情與風度

舊唐書高祖本紀說：「高祖以周天和元年（西元五六六）生於長安，七歲襲唐國公，及長倜儻豁達，任性真率，寬仁容衆，無貴賤咸得其歡心。」創業注卷一說：「帝（指高祖）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而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近承風，咸思託附。」這是唐高祖性情的一個輪廓。

舊唐書高祖本紀說：「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謂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爲人主，願自愛勿忘鄙言。』」此語固不可過信，而唐儉說高祖，復有：「明公日角就庭。」之語（舊唐書卷五十八唐儉傳）「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創業注卷一）都可作爲高祖相貌的參考。

舊唐書卷五十九姜謩傳載：「謩大業末，爲晉陽長，會高祖留守太原，見謩深器之，謩退謂所親曰：『……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必爲撥亂之主。』」舊唐書卷六十一竇抗傳說：「及聞高祖定京城，抗對衆而忤曰：『此吾家妹婿也，豁達有大度，眞撥亂之主也。』」因歸長安。」同書卷五十九任瓌傳記曰：「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觀吾此舉將有濟否？』」瓌曰：『……公天縱神武，親舉義師……』」竇抗之言，或因其爲親戚，任瓌之言，或因其有求於高祖而逢迎，姜謩與高祖本無淵源，所說的話是「退謂所親曰」的，孟子見齊襄王後，可以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姜謩竟稱……「唐公有霸王之度。」必非隨便荒言。

舊唐書卷九十三李靖傳說：「大業末，爲馬邑承，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同書卷八十八劉文靜傳說：「高祖爲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以「有文武材略」的李靖，和「才略實冠時人」的劉文靜，在差不多同一時間裡，對高祖有同樣的觀察，當非全無根據的。唐高祖未起義以前的氣概，由此可以映出。

(二) 唐高祖的才識

舊唐書卷五十一高祖太穆皇后竇氏傳說：「后……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創業注卷二說：「義旗之下……帝時善書，工而且疾，真草自如，不拘常體，而草跡詭媚可愛，嘗一日注授千許人官，更案遇得好紙，走筆若飛，食頃而訖，得官人等不敢取告符，乞寶神墨之跡，遂各分所授官名而去。」據此可知高祖善書。

舊唐書高祖太穆皇后傳稱：「……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總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王長公主。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宮中……毅……謂長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許人，當爲求賢夫。』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於我帝（高祖）。」舊唐書高祖本紀說：「（大業）十一年，煬帝幸汾陽宮，命高祖往山西河東黜陟討捕，師次龍門，賊帥母端兒帥衆數千簿於城下。高祖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賊乃大潰。」創業注卷一也說：「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可見高祖的善射，是沒疑問的。

舊唐書高祖本紀說：「及楊玄感反，詔高祖馳驛鎮弘化郡，兼知關右諸軍事……時煬帝多所猜忌，人懷疑懼，會有詔徵高祖詣行在所，遇疾未謁。時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沉緬納賄以混其迹焉。」這是高祖陽沉於酒以避猜忌的遠識。創業注說：「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爲太原道安撫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爲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這是高祖由遠識而更進一步的預爲布置。同書又說：「煬帝後十三年，勅帝爲太原留守……帝遂私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曰：『唐固吾國，太原卽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爲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由此更可看出高祖具有看大局瞭如指掌的遠識。

房玄齡博覽經史，爲命世之才，史家比以漢代蕭何。高祖嘗對侍臣評玄齡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我兒（指太宗）陳事，必令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舊唐書卷六十六房玄齡傳）足見高祖對玄齡爲人的認識。

舊唐書卷五十八武士彠傳：「初義師將起，士彠不預知，及平京師，乃自說云：嘗夢高祖入西京升爲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太原副留守，爲高祖所殺）之黨也。以汝能諫止弘基等，微心可錄，故加酬効，今見事成，乃說迂誕而取媚也。』這是高祖識破「迂誕取媚」的一個例證。

舊唐書卷六十二皇甫無逸傳載：「明年，（皇甫無逸）遷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刑政未洽……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承制除授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微倖上變云：『臣父在洛陽，無逸爲母之

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倡（逼）於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爲清正，此蓋群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我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往慰諭之。俄而又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瑒不協，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瑒罪狀。高祖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是邪妄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因令劉世龍，溫彥博將按其事，卒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瑒亦以罪黜。無逸既返命，高祖勞之曰：「公立身行己，朕之所悉，比多潛訴者，但爲正直致邪佞所憎耳。」尋拜民部尚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上這些故事，充份可以表現高祖具有審辨詐僞的見識。其他表現高祖有識之處很多，分別見於高祖處事一項，茲不贅述。

（三）唐高祖的用人

唐高祖用人的第一步是結納人才。他用種種方法盡力結納與搜求。舊唐書高祖本紀說：「及楊玄感反，詔高祖馳驛鎮弘化郡，兼知關右諸軍事。高祖歷試中外，素樹恩德，及是結納豪傑，衆多款附。」這是高祖鎮弘化郡時結納豪傑的情形。至於高祖作太原留守時結納人才的情形，據溫大雅的記載是：「遠近承風，咸思託附，（高祖）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賂施，卑身下士，遠乎嚮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創業注卷一）

屈突通是隋朝守河東的名將，高祖起義後，曾親率軍攻之不下，後高祖派劉文靜竇琮等擒之，劉胸記曰：「遂擒通送於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代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從平薛舉時……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始終，名下定不虛傳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物一千段。」（舊唐書卷五十九屈突通傳）。劉胸記高祖用李靖事曰：「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鑠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爲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亦固請，遂捨之。」（舊唐書卷六十七李靖傳）這兩件事是說明高祖用人不避仇敵的。

「大業末，從征遼，賞乏，行返汾陰，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諷吏，捕繫年餘以贖論。因亡命，盜馬自給。至太原，陰事高祖。……自是蒙親禮，出入連騎，間至臥內。」（新唐書卷九十劉弘基傳）。「順德仕隋右勳衛，避遼東之役，逃匿太原，深爲高祖太宗所親委。」（舊唐書卷五十八長孫順德傳）劉文靜本是「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劉文靜傳）的罪犯，高祖也讓他出獄任大將軍府的軍司馬，不久以後，就派他出使突厥。可見高祖的用人，是不放棄罪犯的。高祖一面自己盡力搜求人才，一面令太子秦王結納人才，但仍感到不足，還隨時隨地接受部屬對他推薦的人才。高祖接受推薦的人才很多，舉其重要的例子如下：

「珪……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舊唐書卷七十一王珪傳。）「（武德）五年，侍中陳叔達薦仁師才堪史職，進拜右武衛錄事參軍，預修梁魏等史。」（舊唐書卷七十四崔仁師傳。）「劉世龍……大業末，爲晉陽鄉長，高祖鎮太原，裴寂數薦之，由是甚見接待。」（舊唐書卷五十七劉世龍傳）高祖的待人，大體寬厚，愛護、禮遇、依重，不像漢高的慢而侮人（史記王陵語）不像隋文帝的「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隋書文帝本紀後史臣語）通鑑大業九年八月記曰：

「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弘化郡）執之（指元弘嗣）。因代爲留守，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舊唐書高祖本紀也說：「高祖歷試中外，素樹恩德。」這都是高祖待人寬厚的籠統記載。至於舊唐書，記載高祖待人之處更多了。茲舉數條如下：

卷七十八于志寧傳：「大業末，爲冠氏縣長，時山東盜起，乃棄官歸鄉里（雍州高陵），高祖將入關，率群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卷六十二楊恭仁傳：「楊恭仁……隨至河北，爲（宇文）化及守魏縣，時元寶藏據有魏郡，會行人魏徵說下寶藏執恭仁送於京師。高祖甚禮遇之，拜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卷一百九十一崔善爲傳：「仁壽中，稍遷樓煩郡，同戶書佐，高祖時爲太守，甚禮遇之。」卷五十七錢九隴傳：「（錢）九隴，善騎射，高祖信愛之，常置左右。」同卷許世緒傳：「許世緒……見隋祚將亡，言於高祖曰：『……高祖甚奇之，親顧日厚。』」卷七十七柳亨傳：「柳亨……隋末歷熊耳正屋二縣長，陷於李密，密敗歸國……享容貌魁偉，高祖甚愛重之，特以殿中監寶誕之女妻焉，即帝之外孫也。」卷一百八十七常達傳：「常達……數從高祖征伐，甚蒙親待。」卷五十八長孫順德傳：「長孫順德……逃匿於太原，深爲高祖太宗所親委。」卷六十二鄭善果傳：「鄭善果……建德又不爲之理，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於京師，高祖遇之甚厚。」卷六十一溫大雅傳：「溫大雅……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高祖鎮太原，甚禮之。」

若遇特殊關係或特殊情形，高祖對人的恭敬更甚了。大穆皇后從父兄寶威，高祖對他甚爲親重，「或引入臥內，常爲膝席。」「及寢疾，高祖自往臨問。」（以上俱見寶威傳）劉德威被劉武周所獲，令他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劉德威自拔歸朝，高祖親勞問之。（事見劉德威傳）對裴寂是：「……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而不名。」（裴寂傳）對蕭瑀是：「委以心腹，凡諸政務，莫不關掌，高祖安臨軒聽政，必賜升御榻，瑀既獨孤氏之婿，與語呼之爲蕭郎，國典朝儀亦責成瑀。」（蕭瑀傳）都是實例。

舊唐書卷六十一陳叔達傳：「（武德）五年，進封江國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物三百段。」這故事既可表現高祖待人之厚，並且可以表現出高祖對於孝的觀念。

高祖對於部屬，常常因其才而用，例如劉文靜的才略實冠時人，高祖就派他連突厥以益兵，溫大雅少好學以才辯知名，高祖就引他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令他專掌文翰，陳叔達頗有才學，十餘歲時嘗在陳國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高祖就授他爲丞相府主簿。皇甫無逸性情廉介審慎，高祖就命他爲御史大夫。鄧元珪能隨機應變，所以高祖就命他屢次出使突厥。劉世龍是晉陽鄉長又出入王威高君雅家，所以高祖就命他探聽王威高君雅的行動，例子不可勝舉。劉世讓已除廣州總管，將就職之前，高祖問他防邊之策，因爲他說的極有道理，高祖即刻就命令他停止去廣州而去戍崞城。可見高祖是因人之才能而加以委任的。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李素立傳說：「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之。素立諫曰：『……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自是屢承恩顧，素立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復要。』」舊唐書卷五十九姜謩傳說：「姜謩秦州上邽人……及平薛仁果，拜謩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涼州之路，近爲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謩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由上二事可以看出，高祖對於官的性質既很熟悉，對於人與官，人與地都要極力求其適當的態度。

高祖對人才既注重安排，安排以後，又多信任不疑。舊唐書卷五十八殷峤傳說：「義兵起，召補大將軍府掾，參預謀略，授心腹之寄。」同書卷六十溫大雅傳附大雅弟大有傳說：「大有，字彥將性端謹，少以學行稱……及破西河而還，復以本官（太原令）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大有以昆季同在機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爲疑，卿何自疑也。』……會卒，高祖甚傷惜之。」這些事都可表現高祖對部屬的信任。前面所引皇甫無逸事，一方面可以證明高祖的見識，同時亦是高祖對部屬信任的好證據。

高祖不只信任部屬，而且能接納他們的諫諍。舊唐書卷七十五孫伏伽傳說：「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其一曰……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陷失之不難也……其二曰……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擬五月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子孫謀爲後代法也……其三曰……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擇而任也……」高祖覽之大悅，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先誠，臣僕諂諛故弗之覺也……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慨，詞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行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頒示遠近知朕意焉。衆賜帛三百匹。』時軍國多事，賦歛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高祖並納焉。」

劉武周攻并州，元吉棄城走，高祖以爲係宇文歆之計欲斬之，李綱諫止之曰：「宇文歆論情則疏，向彼又淺，王（指元吉

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敢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爲過。」（舊唐書卷六十二李綱傳）第二天「高祖召綱入升御座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同上）」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多畋狩，（褚亮上疏諫曰：『……高祖甚納之。』（舊唐書卷七十二褚亮傳）都是高祖納諫的實例。

武德二年，「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任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善盡忠穎，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孫伏伽傳）這充份可以表現出來高祖渴望群臣對他納諫的誠意。所以後來孫伏伽「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納焉。」（同上）

舊唐書卷七十五蘇世長傳說：「嘗引之（指蘇世長）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殿煬帝所作耶？是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疑而言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瑤瑤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深然之。」蘇世長是否知道披香殿爲高祖所造，無從證實，但是對唐高祖而黑隋煬帝，終有指桑罵槐的設詭疑之嫌，高祖仍然是「深然之」，可見高祖是有容人之量的。同傳內又說：「即日擢拜（世長）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耽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蘇世長這種諫法，蹟近諷刺。高祖雖於乍聞之下變色，終能笑着和緩下去，尤可見他有容人之量。

高祖的用人，不只消積的納諫與容人，尤是注意到積極的鼓勵。鼓勵的方法，略可分爲精神鼓勵與物質的賞賜兩種。舊唐書卷六十八秦叔寶（瓊）傳說：「拜馬軍總管，又從征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居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立功効，朕肉可爲卿用者，當割以賜卿，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同書卷六十二鄭元璠傳說：「頡利嗣立，留元璠每隨其牙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遣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璠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廷，累載拘繫，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寺卿。」同書卷五十九丘和傳說：「煬帝遣和爲交址太守……及（蕭）銑平，和以海南之地歸國，詔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國譚國公交州總管。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高祖遣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之興，引入臥內，語及平生，甚歡，奏九部樂以饗之。拜左武侯大將軍。」劉威爲薛仁果所執不屈而死，常達爲薛舉所執，詞色抗厲不爲之屈，「及仁果平，高祖見達謂之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劉威常達須載之史策也。』」這都是高祖對臣下精神的鼓勵。

高祖對功臣的物質賞賜，多的不可勝舉，茲略舉數條如下：秦叔寶傳：「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錄前後勳，賜黃金百斤，

雜綵六千段……世充平，進封翼國公，賜黃金百斤帛七千段。」李勣以李密舊地降唐：「高祖大喜曰……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英國公，尋加右武侯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其父蓋爲濟陰王。」（舊唐書卷六十七李勣傳）。

（四）唐高祖的處事

創業注說：「帝或口陳事緒，手疏意謂，發言折中，下筆當理，非奉進旨，所司莫能裁答。義旗之下，每日千百餘人，請賞論勳，告冤申屈，附文希旨，百計千端，來衆如雲，觀者如堵。帝處斷若流，常無疑滯。人人得所，咸盡歡心，皆嘆神明，謂爲天下主也。」舊唐書高祖本紀後史臣曰：「高祖審獨夫（指煬帝）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辭答李密之書，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由這兩段記載，可以現出高祖處理事情能力的輪廓。」

當高祖起義太原之初，兵力尙薄弱，而雄據塞外的突厥，勢力強大，並且一度抄逼太原，幸高祖應付有方，突厥始退。高祖爲達到順利入關的目的，必先減去後顧之憂，所以決定先與突厥通好，創業注記其事曰：「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當爲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當今隋國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爲上天所責，今我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若能從我，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命封題署云某啓，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啓爲書。』帝笑而謂曰：『……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胡奔越，書生不少，中國之禮，併在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輕慢，猜慮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塞外群胡，何比擬凡庸之一耳。且啓之一字，未直（值）千金，千金尙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憾。此非卿等所及。』乃遣使者馳驛送啓始畢（可汗）得書大喜。……作書報帝。」

「（義寧元年六月）丙申（十七日）突厥柱國康鞘利等并馬而至……丁酉（十八日）帝引康鞘利等，禮見於晉陽宮東門之側舍，受始畢所送書信。帝爲貌恭厚，加饗賄鞘利等大悅。乙巳（二十六日），康鞘利等還蕃，乃命司馬劉文靜報使，並取其兵，靜辭。帝私誡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來，敬煩天心，欲存民命，突厥多來，民無存理，數百以外，無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爲邊患。又胡馬牧放，不煩粟草，取其聲勢，以懷遠人，公宜體之，不須多也。』」（創業注卷一）這是高祖致書突厥始畢可汗的用意。高祖既要借用突厥的兵，又怕「突厥多來，民無存理。」目的在「取其聲勢，以懷還人。」蓋亦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高祖用意之周，於茲可見。

「（八月）癸巳（十五日）至龍門，突厥始畢可汗遣康鞘利率兵五百人馬二千匹與劉文靜會於廳下。」（舊唐書高祖本紀）

「帝喜其兵少而來遲……謂文靜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馬多人少，甚懷本懷。』」（創業注卷二）「因遣文靜使于始畢可汗……文靜曰：『……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即遣康利領騎二千隨文靜而至，又獻馬千匹。高祖大悅，謂文靜曰：『非公善辭何以致此。』」（舊唐書卷五十七劉文靜傳）由此更可看出高祖以「財帛金寶入突厥」的條件，作聯絡突厥的手段。

舊唐書卷五十三李密傳說：「及義旗建，密負其強盛，欲自爲盟主，乃致書呼高祖爲兄，請合縱以滅隋，大略云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殲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弑後主執代王爲意。高祖覽書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即相阻絕，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成皋之扼，更求韓（信）彭（越），莫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峭函而臨伊洛，吾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群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耨棘矜，爭霸國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撫撫周原，僣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群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秦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鑾麟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殲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尙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於是不虞義師，而專意於世充。」

考高祖覆書李密之時，爲義寧元年（西元六一七）七月。那時，高祖剛剛率軍自太原出發不久，兵只有三萬人，尙未達到靈石縣賈胡堡。只能控制太原和河西一帶地方。當時李密已「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餘萬。」了。而且「東至海岱，南至江淮郡縣，莫不遣使歸密，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並隨使通表於密勸進。」（李密傳）高祖的實力不及李密甚遠，假設高祖的策略不當，而採吳王夫差和晉爭盟黃池的態度，當然不能和李密爭衡，假設高祖不給李密那樣的一封信，李密效齊桓公和子糾的故事，西爭關中，則隨鹿死於誰手，殊難預卜。高祖對李密的誇誕，瞭然於胸，而採「卑辭推獎，以驕其志。」的策略，所以後來李密和王世充鵲蚌相持，而高祖得以乘虛入關，坐收漁人之利。舊唐書李密傳後史臣曰：「李密因民不忍，首爲亂階，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效樂推，唐公給以欣戴，不亦偉哉！」對高祖的稱讚，並非過分。太原起義，許敬宗改爲太宗首謀，高祖令溫大雅致李密書之時，太宗亦隨軍侍高祖側，高祖初接李密來書之時，溫大雅記曰：「帝大悅，謂大郎二郎等曰：『桀賊南柔，強胡北附，所憂此輩，今並歸心，主上志在過江，京都憂死不暇，天下可傳檄而定，何樂如之！』」而太宗並未提出若何建議，又可見這全出於高祖的主張。唐義軍的入

關，爲後來統一的基礎，當時之所以能够順利入關，又是聯和突厥推獎李密兩大策略的成功。於此二事，對高祖的政治策略可見一斑。

舊唐書卷五十五李軌傳說：「時（武德元年八月）高祖方圖薛舉，遣使潛往涼州與之（李軌）相結，下璽書謂之從弟，軌大悅，遣其弟懋入朝獻方物，高祖授懋大將軍遣還涼州，又令鴻臚少卿張侯德持節冊拜爲涼州總管，封涼王，給羽葆鼓吹一部，軌召群僚議曰：『今吾從兄膺受圖籙，據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競立，今去帝號受冊可乎？』……二年，遣其尙書左丞鄧曉隨使者入朝，表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李軌雖然聽了他的部下曹珍的話而沒有去帝號，但終於對唐稱臣，這不能不承認是高祖策略的效果。

其餘在未平王世充之前，據有江淮一帶的杜伏威先降唐，在竇建德尙在之時，遠據幽州的羅藝和據漁陽的高開道先降唐。高祖用什麼具體的方法而收到這種效果，因記載不詳不能確知，但依理推測，當係高祖採用遠交近攻策略的效果。

以上所舉，略可看出祖的外交策略，次言其軍事策略：以上所舉馬邑之役和太原之役，略可看出高祖對厥突的軍事策略，茲再舉兩例於下：

（1）破歷山飛之戰的情形，據溫大雅的記載是：「時有賊帥王漫天別黨，衆逾數萬，自號歷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場帝後十三年，勅帝爲太原留守……帝謂第二子秦王曰：『……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既而歷山飛衆數不少，劫掠少年，巧於攻城，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將軍慕容，將軍羅侯之兵，北寇太原，又斬將軍潘長文首，頻勝兩將，所向無前。於是帝率王威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口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纔五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曰：『此輩群盜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圖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戰，戰必敗之，幸無憂也。』須臾，賊陣齊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爲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爲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爲小陣。軍中莫識所爲。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旌旗從。賊衆遙看，謂爲帝之所在，乃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重，捨戰爭取。威怖而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斬級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老幼男女數萬人，並來降附，於是郡境無虞。」（創業注卷二）

（2）霍縣之役的情形是：「是日（義寧元年八月初三辛巳）未時，帝將麾下左右輕騎數百，先到霍邑城東，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營，且遣大郎二郎各將數十騎逼其城，行視戰地。帝分所將人爲十數隊，巡其城東南而向西南，往往指麾似若安營而攻城者，仍遣殷開山急追馬步等後軍。老生在城上，遙見後軍欲來，真謂逼其城置營，乃從南門東門兩道，引兵而出，衆將三萬餘人。帝慮其背城不肯遠鬪，乃部勒所將騎兵馬左右軍，大郎領左軍擬屯其東門，二郎將右軍，擬斷其南門之路，仍命小縮

僞若避之。既而老生見帝兵卻，謂爲畏己，果引兵更前，去城里許而陣。殷開山等所追步兵前軍統到，方陣以當老生，中軍後軍，相續而至。未及戰，帝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馳而向門，義軍齊呼而前，紅塵暗合，鼓未及動，鋒刃已交，響若山崩，城樓皆振。帝乃傳言，已斬老生，所部衆聞而大亂，捨仗而走，爭奔所出之門，門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懸門不發。老生收入不得，城上人下繩引之，老生攀繩欲上，去地丈餘，軍頭盧君諤所部人等跳躍及而斬之，傳首詣帝。於是兵隨所向奮擊，禁不可止，數里之間血流蔽地，僵屍相枕。日欲將落，帝見戰士心銳，仍命登城，時無攻具，肉薄而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叢書集成本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

由上數次戰役，可見高祖也是長於軍事策略的。

政治以順應民心爲主，順應民心以除苛政安善良爲先。高祖入關初渡河時約情形是：「高祖率軍濟河，舍於長春宮，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數，高祖禮之，咸過所望，人皆喜悅。」（高祖率大軍自下邳西上，經煬帝行宮園苑悉罷之，宮女放還。）（以上均見舊唐書高祖本紀）及達到大興城（即長安）外時，「帝勸諸軍各依壘壁，勿入村居，無爲侵暴，若無兵者。」（創業注卷二），及初克京師，「帝乃遣二公（隴西公，敦煌公）即建成世民）率所統兵，依城外部分，封府庫，收圖籍，禁擄掠，軍人勿雜，勿相驚恐，太倉之外，他無所予，吏民安堵，一如漢初入關故事。」（同上）及軍事稍定以後，「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通鑑卷一百八十四）。（義寧元年十一月）戊午，收陰世師，骨儀，崔毗伽，李仁政等，並命隴西公斬於朱雀街道……餘無所問，京邑士女，懽娛道路，華夷觀聽，相顧欣欣。」（制業注卷二）「壬戌，乃率百僚……迎代王即位……大赦天下……復天下勿出今年租賦，賜民子孫承後者爵一級。」（同上）可見高祖入京前後政治的一斑。

舊唐書卷五十刑法志：「高祖起義師於太原，即布寬大之令，百姓苦隋苛政，競來歸附，旬月之間，遂成帝業，既平京城，約法爲二十條，惟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納言劉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削大業所由煩峻之法。」同書卷四十八食貨志：「高祖發跡太原，因晉陽宮留守庫物以供軍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庫，賞賜給用，皆有節制，徵歛賦役，務在寬簡。未逾年遂成帝業。」又可以看出高祖處理刑律及財政的一斑。他「盡削煩峻之法，」和「務在寬簡，」這是高祖得民心的理由，也是他的政治策略的所在。

總觀高祖的外交策略，軍事策略以及政治策略，可知高祖的處事，既非「優柔失斷」（舊唐書高祖本紀後史臣語）亦非「不明」（范祖禹評語）和「昏暗」（孫甫評語）。實有英雄的氣慨。真不愧爲創業的君主。但高祖的處事，並非如操莽的權詐，有時亦頗具有人情味，唐會要卷四十君上慎恤條載曰：「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甘羅行劫，爲吏所拘，高祖謂曰：『汝何爲作賊？』甘羅言饑寒交切，所以爲盜。高祖曰：『吾爲汝君使汝窮乏，吾罪也。』因命捨之。」再看高祖開宋興貴四世同居

而下詔褒顯（舊唐書卷一八八宋興貴傳），聞張志寬之孝而遣使就弔並表其門閭（張孝寬傳）和親幸國學觀釋奠，聽徐文遠講孝經春秋（徐文遠陸德明等傳）等事，則高祖不只有英雄氣慨，而且有儒家所謂君子之風格。

五、唐高祖被認為平庸的源由

唐高祖在太原起義時，他的長子建成在河東尚未趕到，當時他的得力幹部固然有劉文靜、裴寂、劉弘基、長孫順德等，但是情份最親的莫過於父子骨肉關係，所以太宗是高祖最親密的一個助手。待建成趕到太原，高祖對建成的親密愛護，略與對太宗相等，高祖對他們倆的工作委派，也大致相似。當時軍中呼他們倆為大郎二郎，在溫大雅撰的大唐創業起居注裡對大郎二郎並稱的記載，多的不勝枚舉。到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五月，高祖即皇帝位，那時建成和世民的功業，不相上下，到六月，高祖就依中國歷代立長的傳統辦法，立建成為太子，立世民為秦王。從此以後，太子留在中央輔佐高祖處理政治的時間較多，當時「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世民多在外統領軍隊，數年之間，連着滅了薛仁杲的秦，平了劉武周的定揚，更滅了王世充的鄭和竇建德的夏，又敗劉黑闥，平楊文幹，防禦不斷寇邊的突厥，接二連三的建立軍功，至武德四年，高祖特任命他為天策上將位在諸王公上。秦王又收攬文武將形成一大勢力。太子也不甘落後，納魏徵之勸，屢次出主軍事，數年之間，平稽胡酋帥劉仝成之亂，擒斬劉黑闥，並和秦王一樣的數次出禦突厥，軍功亦不為小，同樣的也結納人才造成一派力量。至武德七年，除梁師都依突厥勢力仍在割據外，其餘群雄都為唐所併滅，唐的統一大致完成。那時，太子和秦王已成兩派勢力，見外侮已除，遂起鬩牆之隙，明爭暗鬥，互不相讓。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雙方正式衝突，結果太子建成和齊王元吉均被秦王部下殺掉，高祖對秦王也無可奈何，只好立他為太子。過了兩個月，便讓位與秦王，就是唐太宗。

太宗即位以後，除分別處理建成餘黨外，更要設法安定天下人心，使天下後世的臣民承認他得帝位是合法合理，他便一方面造出符命，表明他生來不凡應為天子，他得有天下是出於天命，再一方面還要造父命說：他被立為太子以至繼承帝位全是出自高祖的意思。造符命就說：太宗「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二龍戲於館門之外，三日而去，高祖之臨岐州，太宗時年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這點是歷代都有的，比較簡單，造父命必先造些根據。除太宗已有的軍功要盡量強調外，還要造出一些特大的功勳，順勢就造出高祖要立太宗為太子的意思來。這些技巧只有史官可以擔任，於是這些事情都必須交給當時的史官去做。

貞觀初年監修國史的是房玄齡，給事中兼修國史的是許敬宗，許敬宗於貞觀十四年（六四〇）開始修高祖和太宗實錄，至貞觀十七年，將高祖實錄及太宗實錄前段（包括貞觀十四年以前）修成，上於太宗。在未修成以前，太宗關心國史的態度，據通鑑貞觀十七年七月的記載如下：

「初，（時間在十七年七月以前）上（指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選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以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指太宗）實錄。」「上不從」，自然是太宗親觀國史了。按朱子奢卒於貞觀十五年，則太宗不聽朱子奢之勸而親觀國史的時間，必在貞觀十五年以前實錄尚未修成之時。太宗對國史記載的關心，於茲可見。依歷代向例，實錄都是到皇帝死後纔公佈的，獨太宗實錄前段在他死前，先行公佈，尤可見太宗對實錄的記載，不肯放鬆的心理。

待高祖實錄及太宗實錄前段修成時，通鑑記曰：「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玄武門之變）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安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令削去浮詞，直書其事。」所謂「令削去浮詞直書其事。」就是太宗命令再加修改了。實錄修成後，太宗還命令修改，可知高祖和太宗的實錄確是依太宗的意思而改成的。

舊唐書卷八十二許敬宗傳說：「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又說：「（貞觀）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才優而行簿」的許敬宗，受到太宗的重賞，對太宗所最關心的將要正天下後世人耳目的大事，必遵太宗之命，盡量的「虛美隱惡」，是很顯明的事實。

許敬宗要給太宗造父命，第一步必須造太原起義是太宗首謀。造出高祖先後說出：「今日破家亡國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和「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的話來。他又怕單造太宗首謀起義，還不足以使天下後世人相信，更要造出太宗的許多功績。（太宗有一些功績確是真實的）要造成太宗是高祖的靈魂，高祖離了太宗就處處失敗。他覺得這樣不能表現太宗的「發迹多奇，聰明神武。」（舊唐書太宗本紀後史臣語），這樣不能奠定高祖允許立太宗爲太子的基礎。不一樣，不能表現出太宗的得天下爲正大光明。因此，只要有一點可以表現太宗豐功偉績的地方，都要盡量表現。爲使天下後世人相信太宗殺建成元吉的正當，不惜罵太子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聞於遠邇。」（高祖實錄語）罵元吉「性本兇悞，志識庸下，行同禽獸。」（太宗實錄語）。對於在情份上不得不稍留情面的高祖，不得不壓抑着怒氣，不作顯明的正面的辱罵。但是爲表現太宗時時處處「援狂瀾於既危，扶大厦於將傾。」的大功，而委屈高祖一點（即襯得高祖平庸些），許敬宗那裡還能顧得到？「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的許敬宗，爲獻媚取悅於太宗，能不盡量將史事改造嗎？（他把高祖平歷山飛的事，改爲太宗「拔高祖於萬衆之中，」把高祖平霍邑事改爲太宗的軍功等等不可勝舉。）以上所舉有關高祖平庸無能的記載，都是在這

樣要求之下，許敬宗一手造出來的。因為全非事實，所以不免和其他原有史實的記載，發生不可解釋的衝突矛盾。

許敬宗偽造史事，也有他的技巧，一面要將假造的史事參在真的事實中間，使人不易分辨，一面選擇容易造假的机会，造得表面也入情入理，除非細察深究，不容易找出破綻。太宗起義前，太宗入獄見劉文靜是事實，高祖「與（裴）寂有舊……每延之宴語。」也是事實，許敬宗便加以改變，造成太宗首謀舉義一套曲折有趣的故事。在賈胡堡時，高祖確有和大郎二郎等商量的事實，許敬宗一變而為高祖命令旋師，太宗哭諫了。宋金剛陷滑州其勢甚猛，都是事實。許敬宗就乘機會造出高祖令僅守關西，太宗表諫的記載。竇建德來援王世充，封倫（德彝）等恐腹背受敵請退師觀變，也是事實。許敬宗為加強表現太宗觀察的正確和意志的堅定，又造出高祖密令班師的假事來。突厥的屢次寇邊是事實，也或許有人妄言遷都，又給許敬宗一個偽造的機會。因為不先說高祖的平庸無能，不能把太宗的功業表現的充份和生動，正如烘雲托月，不將雲畫的很黑，不足襯出月亮的光明一樣。於是許敬宗就將高祖作為太宗的黑雲了。

許敬宗作成高祖和太宗的實錄，經五代而至宋，均流傳於世，五代時劉昫據之而修舊唐書，宋范祖禹據之而作唐鑑，歐陽修又據之而作新唐書，至司馬光作資治通鑑，仍以實錄為根據。其他等等有關唐代的著作，也都仍而不改。司馬光復作通鑑考異，凡舊唐書新唐書與實錄抵觸的，多從實錄。新唐書之作，當時人稱為「補緝闕亡，黜正偽繆。」通鑑之作，後世人一士致讀為「精博詳審」。有關高祖平庸無能的諸項記載，是經過司馬光的審慎考證以後，根據高祖太宗實錄而保留下來的。後世人士相信司馬光考異功夫作的正確，所以對司馬光經考異以後而保留下來的記載，便信而不疑了。好像經過名家鑑定的古物，無人再去懷疑它是贗品了。所以許敬宗所偽造的有關高祖平庸諸記載，引導後世人士發生錯覺以至今日。在司馬光作成通鑑前，孫甫作唐史論斷，他根據許敬宗所偽造的史料，對高祖大肆批評，一則曰：「何昏暗之甚也」二則曰：「經世之略，何其淺也。」三則曰：「非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去矣。」當時一些名人如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曾鞏諸人，對其書都著文表示稱讚。因此，後世讀者對高祖的平庸，更增加了相信力。

除此以外，另有容易使人發生錯覺的所在。太宗即位以後，內則成貞觀之郅治，外則立功四方，四夷君長尊之為天可汗，確如吳兢所稱：「太宗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貞觀政要序）使後世人看來，可作高祖的靈魂而無魂色。而高祖雖是一世英雄，但對玄武門事變，終不能免失察之咎。據有史識如王夫之者，尚可作：「高祖之處此難矣！非直難也，誠無以處之，智者不能為之謀辯，勇者不能為之決也。」（讀通鑑論卷二十）的公平平論，一般讀書未能深察者，據許敬宗所作高祖太宗實錄經過司馬光考異而保留下來的記載，據高祖未能防患於未然的事實，而斷為高祖平庸無能，也是極為自然的事。相沿既久，假變為真，以至成為衆所共信了。

六、總 論

許敬宗雖然能很技巧的竄改歷史，但是他所竄改的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雖然可以欺騙得過千餘年來的無數讀者，但是終不足以將事的真實面目整個的徹底的掩沒。譬如在鏡子上撒了一些塵土，而沒有將鏡子全體遮蔽，一經拭去塵土，便可立見原有的光明。因為許敬宗的主要目的，在益太宗之美而證明他得天下為正當，偽造高祖的平庸無能只是為的烘托太宗，至於高祖和其他群臣的言行事蹟，因為與太宗沒有直接關係，所以許敬宗便認為是枝節而顧及不到了。因此許敬宗雖因修高祖和太宗的實錄而被封為男爵，但是在他所竄定的記載裡，還留下許多漏洞。

第一 經許敬宗所竄定而留下來的有關高祖的記載，現在依照發生的時間（實際有些事情並未發生）先後排列起來，如果都假設為真，則高祖成為忽智急愚，忽明忽昏的奇怪人物了。考歷史上的人物，一時為一世之雄而一時消聲匿跡的，固然有，但是都是以時間的先後而為賢不肖的分野的。至於忽智忽愚忽明忽昏的，則史無先例。於生理理事亦決不可能。據此，有關高祖的諸記載，如庸愚為真，則明智的記載為假。如明智的記載為真，則庸愚為假。本文前後所引的諸記載，除一部出於創業注另論外，其餘大部分出於新舊唐書及通鑑。考這些書籍的取材，多淵源於高祖太宗的實錄，而高祖太宗的實錄都是經許敬宗由國史刪改而成的。許敬宗修實錄的目的在益美太宗。為益美太宗而誣高祖不仁，為專美太宗而歸太宗之過於高祖，司馬光已有定評（見前）。如此，有關高祖平庸無能的諸記載，必係根據許敬宗所作高祖太宗實錄而來的，也就是許敬宗所偽造的。這是不可信的理由之一。

第二 高祖的創建帝業，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鐵的事實。如果高祖像後世人所想像的那樣平庸，而唐代得天下全出於太宗之功，那末，唐高祖的歷史應當如下面的兩種情形：

（甲）在太宗未能進諫之前，高祖處處失策錯誤，毫無事業成就。否則，在他的左右應當有一個像太宗那樣精明能幹的助手在不斷的勸諫他。

（乙）在太宗已能進諫之後，高祖寸步不能離開太宗，倘若離開，就要錯誤百出。

史書記載太宗進諫高祖最早的一次，是在太原首謀起義。（實為偽造，太宗真勸高祖事應當更晚。）在太宗末向高祖進諫以前，高祖處事，並沒有什麼大的錯誤。就是許敬宗所偽造的高祖庸愚的記載（如前面所舉的諸條），時間都在太原起義以後。在太原起義以前，高祖的履歷，已歷任滎陽、樓煩二郡太守，殿內少監，衛尉少卿，山西河東黜陟討捕大使等職，而做到太原留守，已經是「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許世諸語）的重要角色了。在此以前，高祖鎮弘化郡兼知關右諸軍事時，已經是「歷試中外，素樹恩德……結納豪傑，衆皆款附。」（高祖本紀）了。高祖的老助手如宇文士及裴寂等等人士，確實沒有一

個趕得上太宗的。可見那一段的事業，是高祖獨創的。如無能力，何以至此？

自太原起義以後，西取關中這一段時間，大致是高祖太宗父子同行的。自武德元年起，太宗常常被派在外面帶兵。討薛仁果、劉武周、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等，太宗在外的時間，三個月兩個月不等，有時甚至達五六個月。高祖如果平庸無能像前面所述那樣，怎能離開太宗獨立處理朝政？而事實上高祖內部處理政治，外面對付割據的群雄，當不少於溫大雅所說的「百計千端。」他能事事秉着遠在數百里以外的太宗的意旨嗎？太宗率兵在外，同時還能顧及到處理一切內政嗎？太宗用兵西征，同時還能顧到對付東面和南面北面的群雄嗎？唐國坐鎮京師的一切政務最後（也是最高）的裁決者，會高祖其誰？假使他能「處斷若流」（溫大雅語），唐能統一全國嗎？許敬宗不能把高祖的履歷事業改掉，而但造出幾件高祖平庸無能的偽事，借以益太宗之美，這於情於理極難免除衝突矛盾。怎能欺騙得過天下後世所有的讀者？這是有關高祖平庸無能的諸記載，必不可信的理由之二。

第三 更進一步分析有關高祖平庸無能的諸記載，不是太宗一勸再勸，便是太宗表諫或派人勸說，最後都是高祖聽了太宗之勸而免於失敗或得到成功，都是高祖致大廈於將傾而太宗扶之，高祖陷唐國於已危而太宗安之，故事的形式，大致雷同，已使人有非人偽造何至那樣整齊劃一的感想。再者有關高祖明智的諸載，如敗突厥，克霍邑，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辭答李密之書等事，都沒有太宗的苦諫與哭勸。如此，豈不是高祖單等到太宗將進諫以前就庸愚了（每於太宗再諫之前更庸愚）於太宗不勸時反而自己會明智嗎？高祖的庸愚，豈不是專為太宗要進諫而引起來的嗎？這是什麼道理呢？前面既已判斷高祖不會是忽智忽愚的怪人，則專為太宗進諫而設地的有關高祖庸愚的諸記載，很顯然的是：史官許敬宗為要使太宗有進諫之功而預為佈置的必要筆法之下，應運而生的偽造出來。這是必不可信的理由之三。

有關高祖庸愚的諸記載，既不可信，但是有關高祖英明的諸記載，是否可信呢？

第一 許敬宗只注意刪改高祖太宗實錄，對於國史各列傳雖有刪改而未能徹底。他特別注意到六月四日的玄武門之變，和其他太宗功德的添造。只注意功德盡歸太宗，罪過委於高祖。但是在一些名臣的列傳裡與太宗無關之處，許敬宗確不能面面都注意到。所以在這一些列傳裡，還不免側面的透露出高祖的言行和才略來。因為益太宗之美是許敬宗的主要目的，而那一些材料和他那主要目的的關係極為疏淡，因之許敬宗也未能全注意到而一一將它刪除。（事實上也沒有方法盡行刪除），因此，這一些材料，就逃過許敬宗的筆削而幸得保留下來。許敬宗為益太宗之美而添造高祖庸愚的故事，是合乎他的目的的，在他的立場，也是必要的。但是若要為高祖添造一套有關高祖英明能幹或雄才大略的譽美故事，因為和許敬宗的目的不合，當然不在他計劃之內。事實上既完全沒有必要，也絕找不到史料的線索可資證明。簡而言之，有關高祖明智或雄才大略的記載，一定是許敬宗筆削下的漏網之魚，決不可能是許敬宗的添造。如此，這一些記載是可信的，高祖的英明是真實的。

第二 因爲許敬宗所偽造的高祖庸愚諸記載，也有相當的技巧，所以就欺騙得住無數的讀者，宋代孫甫等便根據許敬宗所偽造的高祖的記載而大肆批評起來（如唐史論斷）。但孫甫所批評的是許敬宗所偽裝的假唐高祖，而不是真正的高祖。後世的論史者自然不應當根據孫甫的批評去隨聲附和以憶斷高祖爲庸愚。欲知唐高祖才略的真面目，必須根據許敬宗未改以前的史料，或逃過他的刪改而遺留下來的史料。在高祖的當時，各方面也有一些對他的言論或批評，根據這些言論和批評，可以窺出高祖的才略和他在當時的地位。茲擇錄數條於下：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夏侯端傳說：「大業中，高祖帥師於河東討捕，廼請端爲副……端……說高祖曰『……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指煬帝）聰察，情多猜忍，切忌諸李，強者先誅，金才既死，明公豈非其次，若早爲計則應天福。不然，則誅矣！』高祖深然其言。」按金才是李渾的字，他是大業十一年三月因受煬帝猜忌而被殺的。夏侯端說高祖的時間，約在當年四月到次年十二月以內。那時夏侯端說：「金才既死，明公豈非其次？」而高祖竟「深然其言」可見夏侯端之言絕非過份，高祖之地位，僅次於李金才，够得上被煬帝猜忌的資格了。

舊唐書卷五十八唐儉傳說：「高祖在太原留守……高祖乃召入密訪時事，儉曰：『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同書卷五十七許世緒傳說：「大業末，爲鷹揚府司馬，見隋祚將亡，言於高祖曰：『天道輔德，人事與能，蹈機不發，必遺後悔……公姓當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若遂無他計，當敗不旋踵。未若首建義旗，爲天下唱（倡），此帝王業也。』高祖甚奇之，親顧日厚。」同書卷五十九姜謩傳說：「……大業末，爲晉陽長，會高祖留守太原，見謩，深器之，謩退謂所親曰：『……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必爲撥亂之主。』由是深自結納。」據此可知唐高祖任太原留守時，已具有「霸王之度」，是「天下屬望」，並「握五郡之兵」的重要了。

義寧元年，當高祖由太原帥師入關，尚未渡河之際，李密致高祖書，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高祖令溫大雅覆書卑辭答之。李密得書甚喜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見前）在李密的意思認爲：唐公見推，天下就不足定了，可見李密看唐公的重要。假設高祖是平庸無能，李密能那樣重視他嗎？

舊唐書卷五十九任瓌傳說：「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政，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不至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雄以匡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爲濟否？』瓌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拯亂，公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惟待義兵，仗天順從衆欲，何憂不濟？』」這段記載，既可表現出高祖本人的「天縱神武」，並且可以表現出他所帥領的義師的紀律了。

舊唐書卷六十一竇抗傳說：「大業末，抗於靈武巡長城以伺盜賊，及聞高祖定京城，抗對衆而忭曰：『此吾家妹婿也。豁

達有大度，真撥亂之主矣。」因歸長安。」同書卷七十七崔義玄傳說：「時，（高祖初入關時）黃君漢守據柏崖，義玄往說之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群盜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籙，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遵寇恂寶融之策，及時歸誠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即與義玄歸國。」以上都是高祖初定京城時的事。竇抗係高祖的內兄，所說高祖的話，容或有私人感情，但正因爲親戚，知高祖至切，不見全不可信。至於崔義玄與高祖素無關係，他能評高祖爲有德的真主，而勸黃君漢歸國，則高祖在當時的聲望，於此可以推見。

舊唐書李軌傳說：「軌召群寮廷議曰：『今吾從兄（指唐高祖）膺受圖籙，據有京邑，天命可知……』」同書劉武周傳後附苑君璋傳說：「初（時間約在武德三年四月）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說曰：『唐主舉一州之兵，定三輔之地，郡縣影附，所向風靡，此固天命，豈曰人謀。』」李軌和劉武周都是和唐高祖對立的群雄，而李軌本人和劉武周的部將苑君璋，對高祖竟作如上的評議，則高祖的才略及當時的聲望，不難想見。當那時太宗早已被封爲秦王，並且也常常帥兵征討，漸露頭角，而李軌、苑君璋都是只提高祖而未提及太宗，則高祖和太宗父子兩人在群雄心目中的比重，於茲可見一斑。

第三 溫大雅所作大唐創業起居注成於武德年間，未經許敬宗的刪改，其可信的價值，前已論定。該書既未記太宗首謀起義，又未記賈胡堡太宗夜哭勸阻高祖返師事，與本文前面所考，都相符合，益增其可信價值。至於該書所記高祖的才略，於理亦應可信。縱然退一步假設溫大雅有譽美高祖之處，他所記高祖的才略，與許敬宗未刪去的國史各傳裡所表現的高祖才略，何以能處處完全符合而毫無矛盾？許敬宗專益太宗之美，絕不會譽美高祖。溫大雅不會隱太宗之功而不書，何至譽美高祖？兩種分別論定可信的史料而且也是來源不同的史料，竟然不約而同的完全符合，其可信的程度，可由互證而益彰了。

由以上所述各項理由，高祖才略的真像，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他絕非庸愚，更不昏暗，他豁達大度，雄才大略，不只他本身善書善射，文武兼長，而且知人善任，長於謀略，處事明決果斷，嘗無疑滯，內則臣民一致讚嘆欽佩，誠心悅服，外則割據群雄多望風納款，臣服受封。即敵對的梟雄，亦莫不衷心暗愧勿如，讚爲天命之有所歸，較之漢高祖，無流氓氣而有儒雅風度，較之明太祖，少猜忌心而能寬仁容衆。史臣評之：「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絕非過譽之辭。